

“己”与“异”之协作

——时代的必然性

□ [俄]A.H.吉里文科 彭甄译

我们须对浪漫主义时代诗歌翻译的地位问题给予考察，尤其是从俄罗斯贵族双语心理结构的角度。如果说在现代文化情境中译作经常回避与原作一同出现(语言障碍使得它与原作隔离开来,但是它却作为外语文化的事实被接受),并且读者不得不满足于准确性的神话,那么普希金时代的文化则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全然不同的画面。显然,译作没有故弄玄虚,——这只是众所周知的原作的“拷贝”。这种状况主要出现在对法语文本的翻译中,再就是在对英语和德语文本的翻译中。自由利用原作(以及在法国译者笔下已经发生变形的原作)的普希金时期的文化造就了大量相互竞争、相互修正的译作。在类似的情境中,从我们现代观点看,诗歌翻译变成了某种过剩的行为:为什么总体上还需要它呢,如同 H.A.波列沃依(他似乎是在为自己的同时代人代言)所承认的,“当然,我们可以阅读拜伦的原著、阅读他的德语和法语译本”,波列沃依继续写道,“但是,转换成母语的译作以特殊的方式为我们把握异域的作品”。^①值得注意的是,译作被理解为针对原作的“自己的”民族版本,那么该浪漫主义时代——不是别的什么时期,而是将“异己的”语词加工改造成为“己—异的”语词的唯一阶段。这是一种创造性占有,对异己的创造性改写。普希金时代的文学家们通过占有标示出文学语境中翻译的文化功能。在此,译作被理解为针对原作的“自己的”民族版本。我们回想起 B.K.屈谢尔贝克尔的观点:“按其地理位置,俄国可以为自身获取欧洲和亚洲

^① 关于 И.И. 科兹洛夫翻译拜伦《阿比道斯的新娘》译作的评论,1826年。引自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о переводе. Л., 1960. С. 173。